

楚汉英雄气概与“同理心”

□ 汝铁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楚汉传奇》中，两位主人公刘邦、项羽出身殊途、性格不同、结局迥异，但都发出过相同的呼声，就是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

《晋书·惠帝纪》中记录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在付之一笑之余，静心想来却不足为奇。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商以大富为目标，在仕以高官为期望，“升官发财”成为升斗小民最广泛的祝福语，断不会向下设想做老百姓，更不去实际经历市井百味，晋惠帝的这个笑话应属必然。

笔者在从事中德政府官员培训项目时，发现了一个新鲜事。德国官员培训时，常会设定某一情境，且过后有个必问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你作为市民希望政府怎么做？”这个问题较之楚汉英雄的气概，似乎相去甚远。究其根源，这是对现代企业管理“同理心”训练的借鉴。从上世纪末开始，一些发

真正的改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制度，还是要使官员能够真正做到

力戒空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

国家广泛开展新公共管理运动，实施“重塑政府”、“政府再造”、“向企业学习”等举措，认为政府管理与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公众属于消费者。在企业的“同理心”训练中，常常是高管被设定为一般员工，销售员被设定为消费者，研发者被设定为用户等。训练目标是设身处地地了解对方真实想法，这样才能使产品、服务受社会欢迎。

由于经常去国内外城市出差，我总结了一个检验当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质量的“土办法”：下飞机或火车后，乘公交、地铁到住地，搬运行李的次数越多，说明这个地方的城市规划、管理水平越低；反之则相反。在众多出差

经历中，瑞士洛桑搬运行李的次数最少。比如，在洛桑，公交车到站后，气动装置缓降车底，使车底与地道同高，乘客可以轻松将箱子拉出，为出行者考虑得颇为周到。瑞士同行介绍说，瑞士的公共设施设计和某项服务在推出之前，设计者、服务提供者要以使用者、接受服务者的身份反复试验，身体力行地作为市民进行实际体验，直到满意为止。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谓问题不少：市政设施地上建筑宏伟壮观，地下管线年年难敌“50年一遇暴雨”；地铁、公交等迷宫般复杂，换乘费时费力；房地产项目手续繁杂，少则要盖几十

个章，多则上百个；主管者迟迟不理尘肺病诉讼，直到打工者开胸验肺，等等。假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位置互换，相信处理问题思路就会大不相同。

反思我们的教育，通常是宏大理想居多，细节设计较少；向上瞻望居多，向下站位缺乏；泛泛而谈多，实操训练少。在教育培训中，“假如我是市长”、“假如我是校长”、“不要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等常成为惯用语。常见的“人民城市人民管”、“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社会治安人人有责”等口号，也大多以类似的价值观为隐含前提。

好在上述现象正在逐步改变：2012年北京市制定国内首个轨道交通设计地方标准，规定换乘不超过5分钟，高于6米要有扶梯……近年来，房屋拆迁改为房屋征收，个人权利在增强……当然，真正的改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制度，还是要使官员能够真正做到力戒空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



今天的观众更幸福

□ 何不器

平面媒体发稿手段越来越丰富，高清电视技术和传输手段更是日新月异，让体育比赛的传播再现日趋多样化，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拓展了更大的盈利空间。

澳网进入尾声，比赛更精彩，观众也看得越来越投入。

从1905年艾伯特公园内的仓库老板板球场到如今的墨尔本公园球场，对现场观众而言，网球赛事本身100多年来几乎没有大的改变。不同的是，当时的人们是从第二天的报纸上才知道罗德尼·希斯夺得冠军的经历，今天则可以借助电视或网络同步了解罗德·拉沃尔中心球场的赛事，甚至可以比现场观众更清晰地看到运动员面部的表情，更精准地看到时速200公里以上的网球仅以几毫米的重合在边线上溅起的瞬间。这些都有赖于媒介的力量。

近代体育传播可以追溯到1883年的约瑟夫·普利策，那一年他买进了纽约《世界报》，形成近代报业的雏形。普利策根据读者的需求，首先成立了体育编辑部，配备专职体育记者，发表体育消息。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体育传播手段并没有质的飞跃，基本停留在打字机（在中国则是纸和笔）、电报、电话，最后变成印刷文字和图片的过程。直到20世纪两次新技术革命以后，电子计算机、电视、互联网络的出现，才让体育传播媒介有了让人惊讶的发展。

中国的体育新闻工作者，真切地感受到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诸多变化。作为中国资深体育记者之一，《羊城晚报》的苏少泉在北京采访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时，每天采访后都要彻夜坚守在西单电报局，把抄写成电报格式的稿件发回报社（当时国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每分钟2元多，还要排队几个小时）。24年后的第五届全运会将在上海举行，某著名大报体育部主任的房间引来许多同行串门，因为他屋里摆了一台当时的稀罕物——传真机。苏少泉回忆说，洛杉矶奥运会后，他说服报社用将近3000美元的价格购进一台传真机，那台机器近40斤重！外出采访使用时还经常断线，因为当年宾馆电话都是人工接线方式，接线员发现这个房间的电话长时间没有声音，就会把线路切断。1985年，“柯达杯”16岁以下足球世界锦标赛在中国4个城市举办，某地新闻中心的电话线路不够使用，抢不到电话的外国女记者坐在地上无奈地嚎啕痛哭。进入上世纪90年代，许多记者开始使用计算机，但稿件的传输更多还是使用点对点的专用线路。短短几年之后，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上面说的一切都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变成了历史。

平面媒体发稿手段越来越丰富，高清电视技术和传输手段更是日新月异，让体育比赛的传播再现日趋多样化，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拓展了更大的盈利空间。根据普华永道公司2011年底发布的预测报告，媒体授权是体育市场的第三大收入来源，占24.1%份额。其年均增速在各细分市场中排名第一，为3.8%，2010年的292亿美元到2015年将升至352亿美元。下面这个奥运周期，国际奥委会仅靠出售电视转播权就可以得到43.8亿美元。以互联网传播为代表的流媒体技术和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也开始加入到体育传播的队伍中，让随时随地了解体育新闻、观看体育比赛成为可能。

比起100多年前，今天的观众真是太幸福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版《牡丹亭》。不一样的楼台胜景，一样的姹紫嫣红。

2009年5月18日，是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8周年的日子。在“六朝古都”南京的江南剧院，江苏省昆剧院将上下两本近6个小时的精华版《牡丹亭》从17日晚上连演到了18日凌晨。时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的柯军说，“与昆曲睡在一起，梦都是香的”。

离南京200公里的苏州，是600年昆曲的发源地。8年来，由白先勇制作、苏州昆剧院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香飘海内外，近期又荣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青春版《牡丹亭》让两位主演沈丰英和俞玖林在未过而立之年就获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一时间成为青春偶像，受到高校学子、年轻白领的追捧。据统计，青春版《牡丹亭》在全球近40个城市约70个剧场演出了近230场，其中商演比例约占70%。

在北京，由戏剧大师林兆华和昆曲名家汪世瑜联袂指导的皇家粮仓厅堂版昆曲《牡丹亭》，自

2007年5月18日首演至今，600年昆曲在600年皇家粮仓已创造了600多场的驻演奇迹。厅堂版昆曲《牡丹亭》所创造的商务氛围，用制作人王翔的话说，只有精致地呈现，才是对传统的尊重。

在上海青浦的朱家角课植园，昆曲和园林两大世界遗产的融合打造了别样的园林版《牡丹亭》。谭盾的水乐、黄豆豆的舞蹈设计、张军的昆曲，悠扬的笛箫声和着杜丽娘、柳梦梅的节拍，仿佛那牡丹亭上的月亮是明朝的月亮。先是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特别节目；随后的2011年5月，张军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称号；2012年底，他又将实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带到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此外，还有上昆的大戏版本

——全本《牡丹亭》，北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创排的《牡丹亭》等多个版本，体现了出品人、改编人对《牡丹亭》不一样的理解和演绎，不一样的市场定位；精华版强

调了文化遗产保护地对传统的张扬；青春版让“80后”、“90后”观众成为“昆虫”；厅堂版则接近于明代戏剧精品演出“家班”风范；园林版以实景的模式让观众更全面地体验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透过不同版本的《牡丹亭》，有人看到了自己的青春梦，也有人从中领略了一个爱情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牡丹亭。

其实，在汤显祖创作这部戏的时候，戏曲名家们也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沈璟就曾托他人之名修改过《牡丹亭》，而“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板教小伶”则印证了汤显祖本人亲自指导排演这部戏剧的场景。

不一样的楼台胜景，一样的姹紫嫣红，不同版本的牡丹亭受到不同观众的喜爱，它们各自赢得口碑和包括演出场次、观众人数在内的数字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仅此足矣。

褪去浮华 回归单纯

□ 秦立彦

选择拍一部黑白默片，这必定是《艺术家》的导演最不寻常的创意了。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3D横行的年代，出现一部新的黑白默片，不能不说这是怪事。而这样一部电影却大获成功，就更令人不解——当然这都是在人们观看《艺术家》之前。

《艺术家》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开场于1927年，男主人公乔治是好莱坞的默片大明星，女主人公佩佩是好莱坞的群众演员，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差距悬殊。这个故事会不会是灰姑娘俘获王子、公主俯就平民的组合版？这些疑问在片中都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爱情也是一个相互拯救的过程。佩佩从绝望的边缘拯救了乔治。同时，对乔治的爱可以说使佩佩免于精神上的变异，保持着清新、诚实的自我。

在爱情主题之外，《艺术家》也是对电影史的致敬。故事设置在好莱坞默片被有声片取代之

时。对默片时代的反思只是在那一代结束后才有可能，这又令《艺术家》同真正的默片相比占据了历史优势。

若从反思电影史这个维度看，《艺术家》里的男女主人公不只是在演对手戏，更是名副其实的对手。产业发展的铁律、时代的变迁，使他们成为竞争者，虽然他们并无与对方竞争之意。嵌在这样的历史中，爱情故事也显得不同寻常。

事实上，整部片子里男女主人公见面并不多，大部分时候他们的命运是沿着相反方向运动的，仿佛置身于一场零和游戏。失败的乔治才是此片的焦点和真正的主人公，是对时代潮流作最后抵抗的末路英雄，是片名中的“艺术家”。他的忧伤与绝望是普通默片里少有的。即使在片子结尾，他在音乐片里找到了自己的最后一席之地，但那对他的事业只是有限的安慰和补偿。他的没落是时代使然，天使般的爱人也无法

完全恢复他曾经的荣光。

《艺术家》没有彩色，基本没有对话，更没有炫目的特技、惊人的速度。它的成功或许说明，在一部上乘的电影中，技术仍是次要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时间似乎运转得越来越快，过去被加速地抛入博物馆，成为一小群文物爱好者的专属领地。昨天已经与今天隔着鸿沟，再之前的过去更是恍如隔世。对新、变、快的追求，使我们对过去总难免有一丝蔑视与嘲笑，过去仿佛就意味着“过气”。有多少美的、高尚的东西就这样尘封在过去，也许永远不会再被拜访、被打开。

电影技术在发展，但人文的精髓永不改变，《艺术家》褪去浮华，回归单纯，却散发出别样的光彩。《艺术家》一方面保持着幽默乐观，另一方面则向被历史潮流卷走和遗忘的人们致敬。这部电影也表明，在特别的视角下，经过特殊的加工，过去可以神奇地复活，并瞬间成为令人惊叹的“新”。

啥日子才算好日子

□ 张静

近日，网上正热传一个“好日子表”，其中包括刚刚过去的“2013.1.4——爱你一生一世”这样的好日子，今年还要“闪”8次。比如，2013年5月30日（爱你一生我想你）、2013年6月14日（爱你一生又一世）、2013年7月10日（爱你一生娶定你）等。

笔者发现，这条“好日子表”的微博转发率很高。不难看出，这里所谓的“好日子”指的是谐音美好的日子。但真正过日子，其实是和“谐音”没有多少关系的。春节快到了，不少家庭又在为过

年去谁家而争执不休，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春节这样的日子当然是好日子，这几天的团聚都认为是幸福的象征。

我却不以为然。一年365天，所谓的好日子终归屈指可数。更多平淡无奇的日子，才是生活的主旋律。而“平日”的快乐，远比“节日”短暂的和谐要沁人心脾得多。那些能在平常的日子里出乐子、能把平淡的生活过成段子的人，才是更让人尊敬的人。“日子”过的就是柴米油盐、过的就是平淡无奇。不因节日而

浓、也不因平日而淡，那样的生活才是真幸福。

试想，如果一个家庭平日冷脸相对、熟视无睹、形同陌路，节日却一反常态，推杯换盏、祝福连连、喜笑颜开，那种清晰的反差恐怕连自己都别扭。“和谐的节日、紧张的平日”，想来谁也都会敬而远之。

其实，日子越过也越明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我相信，只要本着“珍惜眼前人、过好每一天”的心态去过我们的日子，那么，天天都是“好日子”。

2013年1月20日，著

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在北京去世。3位著名编剧和资深记者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的于是之先生。

拼的是修养

□ 梁秉堃

是之的艺术修养是多方面的，既懂得诗和画，又擅长书法、篆刻，更能写出一篇篇精美的散文。以纪念老舍先生写的《假如先生还在》为例，来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即可体味到一般。

这篇文章只有1000字，最后的两个自然段是这样写的——

“二十年前的8月24日，当先生走出家门，向北，向太平湖走去的时候，一定会路过我们的首都剧场。我恨我那天没有在王府大街上遇上先生。五十年代，我曾陪先生在那条街上散步过，他边走边指点我演戏的道理。人生本有许多巧合、巧遇，那天为什么就没有叫我遇到先生呢！……那天如果见到了，陪先生走一程路，谈点心里话，哪怕能够使先生的心里多少想开一些也许好点吧……

后来，便是对《茶馆》的批判。批判中也点了我的名。我惶恐，我要求自己要‘态度老实’，于是我批判了自己，也批判了《茶馆》。假如老舍先生还在，我会坦率地告诉他这件事的……”

是之没有用种种“理由”原谅自己，而是真诚地批评自己，真诚地要求老舍先生承认错误，真诚地要求老舍先生批评自己。他谈的是在其极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件非常内疚的事，却谈得那样坦率，那样不矫情，犹如让读者看到了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石。这种质朴平淡的风格，不是正好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人品、情思、秉性和审美吗？

（作者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一级编

看于是之演《洋麻将》

□ 王秋和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是因为话剧《洋麻将》。那是1985年年底的一天，北京人艺负责宣传的王宏韬带着我走上剧场二楼。于是之、朱琳和导演夏淳正在楼梯口迎接着。于是之微笑着握着我的手说，“欢迎记者，非常欢迎！”他没有一点名演员的架子，我感到很温暖，便说：“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还想专门采访您呢！”

于是之从旁边拿起一把折叠椅放到我身边，笑着说：“你先生，还是先看戏吧，我还希望你们多提意见啊！采访的事以后什么时候都行”。他接着用手指着朱琳说，“你先采访她吧，她比我演得好”。大家都被他逗笑了。

剧场很小，观众都坐折叠椅，也只能坐四五十人。演出时，我们离演员只有2米多远，他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表情都清晰可见。在这样的剧场演戏很考验演员功力。全剧100多分钟，两位演员打了14把牌，全靠他们俩人大量的台词功夫支撑。

演到最后一把牌时，于是之扮演的魏勒输了牌，歇斯底里地喊着：“贏！贏！贏！”他用拐杖狠狠地敲击着牌桌，敲掉几张纸牌，其中一张被挑起，飞向坐在第一排的我。由于离得太近，我还没反应过来，纸牌已经打中我的前胸、落在地上。“魏勒”的眼神朝我一瞄，也就是百分之一秒的时间。谢幕时，于是之和我握手时笑着说，“对不起，刚才扑克牌打着你啦，我抡拐杖的力气有些大，哈哈哈！”我摇摇头说，“没关系”。他笑着说，“我演戏就是太投入”。又双手合十：“抱歉抱歉！”细心的于是之这一番话，真让我无比感动。

最后的影像

□ 卢北峰

1996年8月13日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国家话剧院前身）在首都剧场联合上演话剧《冰糖葫芦》。于是之偶尔会忘记台词，朱琳及时搭话提醒。台下观众没有一人埋怨，大家都原谅他、欣赏他。

那天，我在后台的化妆间拍摄完李婉芬，走到另一间时看到了于是之。他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面朝门口发呆，在等化妆师为他上妆。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了最欣赏的表演艺术家，我必须为他留下一张照片。

我端起相机冲对他对焦并拍摄。于是之看到我，没动，也没有表情。他拄着拐杖那么坐着。我正想换个角度再拍时，先生嘴里发了声音，“别拍了，我不好看”。他像是孩子在请求一样小声嘟囔，声音里似乎充满了委屈。我赶紧收了相机，抱歉地微微鞠躬，快速离开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仿佛我好心为老人做事却伤害了他的感情。一位让我如此敬仰的表演艺术家，在我为他拍摄的时候，竟说自己不好看，语气不是在责备我，而是在请求、企望我不要把他“不好看”的模样拍摄下来。但正因为 I 拍摄了于是之，才使得他最后的真实影像——非舞台形象——定在了1996年8月13日。